

中文版序

我在茶館系列研究的上一部著作《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裏，寫下了下面一段話作為全書的結束：

幾個小時以後，他們儘管仍然會像五十年前世紀開始的第一天那樣，把茶館的門板一塊塊卸下，但他們不知道，他們和這個城市一起，已經踏入雖然轟轟烈烈但是已不再屬於茶館和茶客們的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空間將不復存在，人們到哪裏去尋回老成都和老茶館的舊夢？

那麼，現在讀者手中的這本書，就是講述茶館和茶客們在那個「轟轟烈烈」的「完全不同的時代」的經歷。茶館是節奏緩慢的日常生活空間，本身就與「轟轟烈烈」是不相容的。通過對一百年成都茶館的研究，我或許可以得出下面的結論：在轟轟烈烈的時代，茶館會衰落；但是當人們生活趨於平常和安寧，茶館就會復興。轟轟烈烈不可能持久，平平淡淡才是人們生活的本身。

改革開放使中國政治和社會告別了轟轟烈烈的時代，這給予了茶館復興的空間。到了21世紀，茶館發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幾乎沒有人——無論是茶館的反對者或是支持者——會預見到這個結果。

抗戰時期，許多外省人來到成都（四川人習慣稱他們為下江人），對成都人坐茶鋪的習慣非常不理解，特別是在民族處於危亡之時，人們居然還在茶館清談，不是正應了「清談誤國」那句老話嗎？一個叫「老鄉」的人，在1942年12月26至28日《華西晚報》上，發表了題為〈談成都人吃茶〉的系列文章，旗幟鮮明地為茶館和茶館生活辯護。但是有趣的是，他在該文章的最後說道：

如果今後新的公共場所建設，會人約朋，也可以少在茶館裏。我們不主張喊成都茶館萬歲……只消社會進步，有代替茶館的所在出現，它定要衰落，甚至於不存在。不過，在今天，就是這個時候，還沒有代替茶館的地方出現，我們還是只好進茶館，喝香片，休息，談天，辦事，會友，等等……一切的一切，按成都的老話，「口子上吃茶」。

可見，即使這個茶館最堅定的支持者和辯護者，對於茶館的未來也是抱著悲觀的態度，也相信茶館必將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被淘汰。然而，老鄉和當時的人們做夢也想不到的是，即便在今天高度現代化的成都，各種不同類型和檔次的公共娛樂空間令人目不暇接，但茶館不僅沒有衰落，反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

如果說晚清民國時期，成都茶館生意的興隆是由於缺乏其他公共場所的競爭，是由於飲水、燃料、信息傳播、娛樂、休閒、社會交往等一系列的需要；當今這個城市已有各種公共場所供人們選擇，過去家庭飲茶和使用熱水等困難，皆已不復存在，那麼為什麼茶館在數量上，會從民國時期的六百多家發展到世紀之交

的三、四千家，甚至在今天，成都的茶館已經近萬家了？這固然有成都地域擴大和人口增多的因素，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今天的中國，成都茶館可謂是一騎絕塵，任何城市都不能望其項背。為什麼仍然有許多人選擇去茶館喝茶？對這個問題，本書做出了回答並解釋了其內在的動力。

這本關於社會主義時期茶館的研究，涉及「國家」（或者「國家政權」、「國家權力」、「國家機器」）與地方社會、地方文化的關係問題。正如我在《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的前言中指出的，書中所使用的「國家」一詞，乃是指國家政權：

在英文中，與中文「國家」一詞有關的詞至少有三個是常用的，即：「country」、「nation」和「state」。但這三個詞在英語中有明顯區別，country是從地緣的角度講「國家」，nation是從民族的角度講「國家」，而state是從國家體制和國家機器角度講「國家」。在本書中，我所講的「國家」是state，因此經常又是政府的同義詞。作為state的「國家」在本書中有時也具有不同的含義，當相對人民而言，其是「政府」，可以是中央政府，也可以是地方政府……當相對地方而言，其是「中央政府」，具有state和「全國的」（national）的雙重含義。

因此，讀者最好把本書和上面提到的茶館研究的第一部結合來讀，兩者合為成都茶館的一部完整的百年史。這個百年史，雖然主題是茶館，但是也是從茶館這個微觀世界所看到的一部中國城市的百年經濟史、百年社會史、百年文化史、百年大眾史、百年日常生活史，乃至百年中國人的心性史。

這本專著是我寫得最困難的書，在我的全部著述中，本書花的時間最長，付出的精力最多。本書的文獻收集和田野調查是在1997至2003年間完成的，到2017年我把英文版終稿交給康乃爾大學出版社並完成本書的中文版，以及寫下這篇序言的最初版本的時候，已經過去整整20年了。我在當時無比輕鬆地寫道，這個課題「現在終於要畫上一個句號了」。但是沒有想到的是，本書中文版的出版波折重重，其間的坎坷在我的出版經驗中屬僅見。從中文稿完成到修改這篇序言的第三稿，已經四年有餘。需要說明，中文版的坎坷，與本書的學術性和寫作無關，而與本書所涉及的內容和時間段有關。

2006年《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完成後，我便將主要精力都投放到了這部書的寫作上，而且在2006至2007年度作為美國全國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的研究基金獲得者，在那裏待了一學年，全部心思都放在本書的寫作上。當時想，有整整一年寫作的墊底，這個寫作計劃應該是很順利的。但是英文版初稿到2013年才完成，修改更是艱苦，花了幾乎四年的時間。

然而，所有的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本書英文版出版以後，受到學術界的極大關注，《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跨學科歷史雜誌》(*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評論》(*The PRC History Review*)、《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歷史新書評論》(*History: Reviews of New Books*)、《中國研究書評》(*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等西方學術期刊發表了書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特別是《中國研究書評》發表的長篇專題評述，對本書的學術貢獻進行了詳細的討論。

更加令人欣慰的是，本書獲得美國城市史學會 (The Urban History Association) 頒發兩年一度的「最佳著作獎」(2018–2019)，這是繼《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 於2005年獲頒此獎的15年後，我第二次獲獎。頒獎詞稱：

本書的魅力在於從小的城市空間展示出大的政治變遷，這樣，成都茶館成為了一個微觀世界，由此可觀察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以及改革開放後的公共生活和經濟發展。……本書以多學科交叉的研究取向，採用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方法和理論，並挖掘各種歷史文獻，包括報紙、日記、個人記錄，以及茶館文化的口述資料，使這個研究非常深入。總之，本書不僅對中國和全球城市史的研究作出重要貢獻，而且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非西方語境下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這樣的重大問題。

以上提到的書評以及美國城市史學會的頒獎詞，對本書的學術貢獻進行了概括和評述，主要是如下幾方面：第一，從小的城市空間展示了大的政治變遷，微觀史的方法將我們對中國城市的觀察引導深入到社會的最基層；第二，對社會主義時期公共生活的探索，展示了公共生活的變化，給讀者提供大量生動的細節；第三，以多學科交叉的研究取向，採用歷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方法和理論，把公共領域等問題的討論與檔案等文獻的使用有機結合在一起；第四，發現和挖掘了豐富的資料，甚至有論者指出，僅就目前社會主義時期檔案利用存在著的極大困難，這本書都有其特殊的價值；第五，進一步理解不同人群與國家權力的關

係這樣的重大問題；第六，寫作風格適合一般讀者，不僅分析和論述嚴密，而且有大量的有趣故事和描述，等等。

但是，也有西方學者就我對公共領域和公民社會的發展過於樂觀提出商榷，在此我也利用這個機會進行回應。在本書的結論中，我討論了改革開放以後公共領域的發展，將互聯網視為一個可能的替代選項：由於互聯網的普及和發展，任何對言論和輿論的控制都會非常困難；二是因為人們能夠接觸到各方面的信息，言論表達不僅僅只有官方的渠道，公共領域將不可避免地持續發展。

實事求是地說，最近一些年，在中國發表公共言論，的確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但是這些挑戰，並不足以讓我變得對未來更加悲觀，讓我改變對未來的看法。我仍然相信，雖然由於高科技的發展，對言論和輿論的控制更加精準，但是無論如何比起紙媒時代，人們的表達管道還是更多元化了。特別是對於一些突發事件和災害，過去如果官媒不報道，我們便不得而知，也沒有任何地方可對這些問題進行公開討論，但是現在信息和觀點可以迅速擴散，大眾有了傳播和發表意見的機會。

而且，疫情以後，由於網路會議和講座的廣泛使用，民眾能夠更直接地與學者進行對話，知識分子思想的傳播，哪怕是經過了過濾和監控，也超過以往的任何時期。以我自己的經歷為例，2020年12月，我在北京大學的博雅講壇以「公共領域與當代中國的城市管理：疫情期間的歷史思考」為題的講座，據組織者所得到的資料，共有32萬人在線上收看。如此龐大的聽眾群體，是過去紙媒時代無論如何也不敢想像的。我與國內同仁的幾次線上對話節目，聽眾也在幾萬乃至十幾萬。

當然，網上講座的言論並不是可以隨自己意願任意地進行表達，但還是能夠發出理性的聲音。例如我在上面提到的博雅講壇

的講座，主題是公共領域與中國城市管理，而在1990年代，國內歷史學界對公共領域的討論，還是一個禁忌的話題。記得我在1996年第一期《歷史研究》發表了〈晚清長江上游地區公共領域的發展〉一文，接著該刊第二期發表了一篇與我這篇論文進行對話的文章，雜誌便收到了「上邊」不能討論這個問題的指示。

不少學者懷念1980年代的言論空間，認為1979至1989年是改革開放後最自由的年代，我自己經歷過那個時代，現在都還能回想到當時能夠自由呼吸的暢快。但是當我今天細緻梳理那個十年，越來越感到所謂「最自由的十年」其實是一個錯覺，不過是由於人們剛剛從文革十年的噩夢中醒來，那怕是一絲絲鬆動也是刻骨銘心的，更不要說所面臨的是一場歡欣鼓舞的改革開放了。人們之所以懷念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是因為它和之前的文革十年對比太強烈了。

人們懷念1980年代，是因為現在國家政策層面上，並沒有對言論越來越開放，甚至過去已有的空間也似乎在縮小。這實際上也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個人幾乎沒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渠道，一切都必須經過紙媒，而紙媒又是由國家牢牢管控的。且不說第一個十年國家所發動的幾次政治運動（在1990年代開始，這種政治運動就完全消失了），其實學術研究在那十年的禁忌也非常多。我現在還記得，有一次在四川大學召開的關於中國秘密會社的學術討論會上，一位代表的發言涉及當今的秘密會社問題，雖然也不過是學術探討，但竟然要把會議現場的外國留學生都請出場才繼續進行。像這樣的操作，恐怕今天都不會發生。

二是雖然現在國家的言論自由度收緊了，然而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傳播手段的改變，言論的表達實際上已經遠遠超過了1980年代。這不是國家權力的恩賜，而是科學技術發展所帶來的結果。哪怕國家權力試圖採取各種手段來達到控制的目的，但要達

到紙媒時代的那種程度，還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互聯網的出現對我們接受和發佈信息的模式和管道、獲得信息的真假和多少，比國家政策是否改變的影響要大得多。

為什麼我要花筆墨講這個問題？我要再次強調在書中所討論的兩種持續性，即1949年之前和之後以及改革開放之前和之後，並不存在截然的分離。哪怕我們看到了國家政策的巨大改變，其實許多基本政策和執政理念，都是一脈相承的。改革開放對中國帶來的變化，也是我在本書後半部所詳細討論的。雖然政策有時激進、有時漸進，有時左、有時右，與西方關係有時緊張、有時緩和，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對西方三權分立制度的警惕，對執政基礎的擔憂，是一以貫之的。在這個時期最高領導人於執政風格上各有不同，但是許多基本政策都是堅定不移地執行的，特別是關於意識形態、言論、出版和宣傳，基本上沒有什麼巨大的起伏和變化。

不過，我不得不承認，現實狀況已經表明中國的公共領域並沒有按照我所預測的第二點方向發展，而且恰恰是相反。我在早些時候，已經對此表達過我的擔憂。我在前面提到的博雅論壇的講座上，便對政府全方位的介入和公共領域的萎縮表達了下面的態度：

公共領域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公論」，也就是公眾輿論。就是說，不能只有官方的聲音，得有社會、民間的聲音，就是過去我們經常說的什麼事情的評價都是「自有公論」，其實也就是今天我們經常說的「輿論監督」。要讓公眾去對一些重要事情發表看法，做出評判。讓人民參與城市管理的決策，是有益無害的事情，可以讓政府看到民意、民情。……

歷史發展到了今天，一切資源基本上都在政府手中，政府負責管理城市的一切事務，這也導致了政府的不斷擴大，權力的不斷集中。我們人民也習慣於集中力量辦大事，認為這是一個制度優勢。其實，政府太強大，控制一切資源，攬權太多，反而不利於治理。……

中國經濟最穩定而又迅速地發展，人們收入增加，市場和貿易空前繁榮的時期，恰好是政府的作為相對比較少的時代。政府放鬆哪個領域，哪個領域就發展，無數例子證明了這一點。歷史常常是這樣：政府不強力進入，很可能就是它對社會的最大貢獻。我這裏不是要低估國家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應該是在法律、安全、保證公平等方面，保障人民的權利，保障公平競爭，而不是決定經濟怎麼發展，社會怎麼管理。我們經常聽見有人說，中國人太多，地域太大，所以事情難辦。但是人們似乎不懂得，中國的事情難辦，經常就是因為政府介入太多。

不過，我現在還不打算修正我在本書中關於公共領域的結論，因為歷史的發展不是直線的，而是曲折的，事物總是在不斷的變化之中。這種國進民退的狀況，也可能只是歷史長時段的一個彎曲，中國的公共領域——包括公共領域中十分重要的「公論」——的發展也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我對未來仍然抱持一個比較樂觀的態度，仍然相信無論一個人或是機構，試圖在言論、思想和組織上一統天下，幾乎不再可能，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一個必然趨勢。

在互聯網時代，人們的聯繫通過虛擬空間連接起來，海量的信息交換，令對於信息的全方位監控變得越來越困難。可以這樣

說，我對未來的樂觀看法，是建立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之上。當然，悲觀論者也可以這樣認為，技術進步也造成了對控制網路言論技術的進步。但是，我還是堅信，在信息自由與信息管控的技術賽跑中，前者的勝利是毫無懸念的，因為在當今世界上，更多人追求前者，而後者多半是國家的行為。當然，中間的道路有多漫長和曲折，我們今天的確沒有辦法預測。

談到公共領域的問題，我想順便提一下香港和澳門。這兩個城市的公共領域一直比較穩定，那裏自發的社會組織沒有被政府有組織地禁止過，符合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說的「公共領域」幾乎全部的特徵。我說的「公共領域」，包括各種社會團體，這種團體可能是政治的、慈善的、教育的、文化的、社會階層的，以及行業的。並不是說他們不和政府發生關係，或者一定和政府發生對抗，甚至許多社會團體還接受政府的財政資助；但是他們能夠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並在自己組織所代表的範圍內提供服務或者爭取自己的利益。從相當的程度上來講，香港和澳門的公共領域，比改革開放以後在內地出現的公共領域要更為成熟，在城市中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

香港和澳門還有另一個特點，即沒有經歷過像內地城市那樣劇烈的起伏波動。兩個城市都具有殖民地的歷史，這是和近代中國慘痛的歷史分不開的。但是任何歷史都有不同的面相，正是這個殖民的過程，造就了香港和澳門獨特的城市發展路徑，成為中西方交流的橋樑，也都逃脫了內地城市曾經遭遇的肆意毀壞，如讓梁思成痛心疾首的北京城樓、城牆、四合院的大規模拆除。也就是說它們的社會和城市發展在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基本上是處於一個自然的發展狀態。例如在香港，哪怕房價已經非常高，但並沒有出現房地產的瘋狂開發，大量綠地和山地仍被保留下來。而在澳門，為了建立大規模的娛樂設施，即使填海，也沒有對老

城進行大規模的清拆，它的老街區、廟宇、教堂、家庭作坊、老商鋪等基本上都能夠倖存下來。如果對照著名美國城市研究者雅各布斯 (Jane Jacobs)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的觀點，一個城市是否適合居住，並不見於它有多少新的設施或者公園，而在於人們是否能夠在走路的範圍之內，得到比較完整的日常生活服務，包括商店、餐館、咖啡館、理髮店等等設施。那麼，就此而論，澳門也算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地方。對香港、澳門的城市史研究，大可選擇它們自己的「微觀世界」，如茶餐廳、教堂、街市甚至郊野公園，必能揭示全新的歷史圖景，豐富我們對「城市」的認識。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中國學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新成果，雖然本書也涉及一些有代表性的中文著述，但由於內容以英文寫成，主要是針對西方學術界的觀點進行討論和對話，因此引用的英文文獻要多於中文文獻。不過這也有一個好處，中國讀者可以就此了解西方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研究，特別是關於城市研究的一些代表性觀點和成果。

細心的讀者或許可以發現，中文版和英文原版有許多不同的地方，這是因為中文版並沒有完全根據英文版直譯，我儘量按照中文寫作的習慣進行了調整，例如不少引文，英文版只是點到為止，而中文的引述則儘量完整，這也是作者自己翻譯的一種特權吧。另外，本書採用章節附註而非腳註，主要是為了照顧「非專家」讀者的閱讀習慣，以免打斷他們的閱讀。

王笛

2017年5月28日初稿於澳門大學

2017年7月22日二稿於沿長江的旅途中

2021年10月18日三稿於澳門大學